

第一章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

在政治中发现第三条道路已经在全世界成为争论的焦点。“第三条道路”这一术语本身并不新颖。过去众多不同政治信念的集团——其中甚至有一些属于极右派一早已使用过这一术语。当然，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术语用得更经常。在冷战期间，许多人把社会民主主义视为第三条道路，以示既不站在美国的市场自由主义一边，也不属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一边。这一术语一度几乎销声匿迹，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却又在政治讨论中重获青睐。

令人奇怪的是，目前第三条道路观念的流行发端于美国和英国，要知道，在过去，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三条道路的背景。第三条道路的复兴以及随后的广为扩散要归功于以上两个国家的民主党和工

党对它的采用。两党都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当选还重新设计了具体的策略。两党在改装后的称谓也很相像：美国的民主党人被称为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而英国的工党随后就成了新工党（New Labour）。

第三条道路被美国民主党首先描述为“新进步主义”（new progressivism）。1996年由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发表的新进步主义宣言（The New Progressive Declaration）认为，为了应对处于根本变革中的世界，应该号召一种崭新的政治^①。在20世纪初期的第一个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中—左政治为了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已经大幅度地改造了自己。新政（New Deal）即是建立在国家、工会和大企业之间协作的基础之上。

然而，今天这些“大机构”（big institutions）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来履行社会契约了，新民主党人争论说。全球市场与知识经济的到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已经使国家管理经济生活和一再扩大社会福利的能力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它既不是老左派所赞成的官僚主义的和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也不是右派所渴望的干脆取消政府管制。

^①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The New Progressive Declaration*. Washington, DC: DLC–PPI, 1996.

新进步主义的基石被认为是机会均等、个人责任和公民与社群动员。权利必须与责任相伴。我们必须找出照顾我们自己的途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大机构来做这些事。公共政策也得从专注于财富的再分配调整到专注于鼓励财富的创造，在全球性经济中政府应创造鼓励企业创新和使员工追求更高效率的条件，而不是向企业提供补贴。

新民主党人把新进步主义称做第三条道路，最终是人们更加偏爱第三条道路这一术语。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推动了两届克林顿政府采用或准备采用的政策，如：紧缩财政、医疗保障改革、教育培训投资、由福利转向工作的计划（welfare-to-work schemes）、城市新建计划、严惩犯罪，而在国际方面，则提倡积极的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

依靠部分地借鉴新民主党、部分地遵循自己的政治演化路线，英国工党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工党放弃了它自己的“老进步主义”（old progressivism）——即工党党纲中的第 4 款。布莱尔开始用发展第三条道路来指称新工党，最终，他写成了一本叫做“第三条道路”的小册子^①。

布莱尔写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两种形式的政

^① Tony Blair, *The Third Way*, London: Fabian Society, 1998.

治支配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思维和决策，一种是“高度中央集权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另一种是右翼的自由市场的哲学（新自由主义）。这两种形式在英国都以典型的形式存在过，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条道路跟英国有一种特殊的相关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是“现代化的必要措施”，但新自由主义者忽视了解除对市场的管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了社会的凝聚力。

新民主党人和新工党特别重视家庭生活、犯罪和社群的衰退这些问题——这么做是试图把左派的政策与普通市民的基本关注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条道路的家庭观念，它既有别于那些根本无视家庭问题的人，又不同于那些企图使时光倒转到女人外出工作之前的那些人。家庭的变化与反社会行为和犯罪紧密相关，就对犯罪的担忧进行回应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才有托尼·布莱尔那句名言——左派应当“既严惩犯罪，又严防犯罪”。

新工党在英国的首次执政，在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兴趣。然而也就是从那时起，对声称工党正在发展一种新型的中—左政治的回应也就各不相同了。一些欧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调查了这种新型的中—左政治的借鉴意义后，发现它并不动人；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于更能接受它。1999年4月，当时科索沃冲突正处于高潮，在华盛顿有一次关

于第三条道路的公开对话^①。参加者有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托尼·布莱尔、吉哈特·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 及当时的荷兰首相维姆·可克 (Wim Kok) 和意大利总理玛希姆·达莱玛 (Massimo D'Alema)。

盎格鲁-撒克逊的领袖和他们的欧陆同事之间共识颇多。柯克承认自己“非常喜欢”第三条道路的思路，但同时也感觉到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独立地采用了类似的观点和政策。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样，荷兰也是社会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当前的时代，柯克认为，人民仅仅依靠政府的保护就不足够了：他们“必须同样感受到责任感的紧迫性”，“你有权利 同时也有责任”。在一个社会和技术变革十分迅速的世界上，政府必须是授权 (empowering) 而不是事必躬亲。

达莱玛表达了近似的看法。他认为欧洲国家发展了强大的社会团结与保护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却变得官僚主义，从而也就“减缓了增长，制约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第三条道路认为有可能把社会团结与经济活力结合起来，这也是当代社会民主党人应该追求的目标。为达此目标，我们将需要“少一些全国性的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third way: progressive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25 April 1999).

管制，少一些中央管制，而多一些对地方进程（local processes）的治理（governance）”，同时向全球社会的方向进行开放。经济发展需要终身学习和适应新的知识，“文化是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最重要形式，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向文化投资”。达莱玛总结说，这样的思路，必须与老式的福利和社会保护决裂。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布莱尔和施罗德发表了一个联合文件，叫做《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派》^①。该文件意在为欧洲的中—左政党提供一个总体框架。在文件中，两位领导人认为：“政治行动必须补充和改善市场的基本功能，而不是妨碍它”。

布莱尔和施罗德还坚定地与他们所定义的传统的社会民主观拉开了距离。在传统的社会民主观中，对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追求常常被等同于对结果的平等分配的过分强调，所以，个人努力和责任被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成了一种乏味的千篇一律而失去了创造性、多样性和成就感。社会正义被视为不断地提高公共开支，而不顾实际经济实力和税收对企业竞争力及就业机会的影响。社会福利太经常地压过企业精神和社区精神，权利在责任之上，其结果便是

^① Tony Blair and Gerhard Schröder, *Europe: The Third Way—die Neue Mitte*, London: Labour Party and SPD, 1999.

导致相互义务和相互支持的减退。

关于政府，社会民主党人需要一个不同的思路，其中国家“不应该划桨，而是掌舵：它应迎接挑战，而不是太多地控制”。必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监督政府的运作，培养有利于企业的独立精神和主动性的积极氛围。灵活的市场对有效地回应技术变革至关重要，不能对公司的扩展施加太多的规定与限制。同时还要强调，现代化的民主党人并不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信仰者。必须重新定义积极国家（active state）的角色，毕竟还得靠国家来继续实现社会计划。就业与增长不能再靠财政赤字来推进，政府借债的水平应降低而不是上升。

批 评 意 见

由于第三条道路源自这样的政治名流，加上它对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产生的影响，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当然，其中很多来自保守派。大多数右翼批评家认为第三条道路要么是大家久已熟悉的观点和政策的混杂一气，要么就是干脆缺乏任何内容。例如，《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曾有一篇文章谈到第三条道路的“基础内容的空洞”（fundamental hollowness），认为，要想就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哲学给出确切的含义就像“跟一

个充气的玩具人摔跤一样，你一把抓住了一角，所有的热气又冲向另一角。^①

下面我将更加关注来自左派内部的批评。许多左派人士同意保守派对第三条道路的判断，即认为它的主张是难以捉摸的。他们也强调第三条道路的方案实际上从它自身的对手——自由市场主义者（free marketeers）那里借用了许多内容。第三条道路被认为以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左派光芒展现了本质上是右翼的哲学——只是一位不拿手袋的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 without a handbag）。

盎格鲁—撒克逊的批评者

杰夫·福克斯（Jeff Faux）立足于美国的背景对民主党人进行了评论。他同许多人一样，认为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变得太宽泛，更像一个政治的停车场而不是一条通向某个特定目的地的道路”^②。如此宽泛的结果便是，第三条道路这一术语事实上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所能想到的著名领导人——不光是克林顿、布莱尔，还有加拿大的克雷蒂安（Chrétien）、意大利的普罗迪（Prodi）、法国的若斯潘（Jospin）、墨西哥的萨利纳斯（Salinas）

① ‘Goldilocks politics.’ *The Economist* (19 December 1998): 49 and 47.

② Jeff Faux, ‘Lost on the third way’ *Dissent* 46/2 (Spring 1999): 67–76, 75.

和塞迪略 (Zedillo)、德国的施罗德、巴西的卡多佐 (Cardoso)、阿根廷的梅内姆 (Menem)，甚至叶利钦 (Boris Yeltsin)！

福克斯区分了判断第三条道路的三个标准：一是它能清楚连贯地证明与老左派的联系越来越少；二是为给社会民主党创造新的机遇，它能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三是对后冷战时代的各种问题有一个貌似合理的战略。

他承认他所称的“主流左派 (mainstream left)”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但是就以上刚刚提到的三个方面来看，第三条道路都是不充分的。就其在美国的发展方式来说，第三条道路起初并不是被当做一种清晰的哲学来构建的。事实上它不是一种系统性的理论，而是为了应对民主党在 1980 年和 1984 年总统大选中的失败而设计的策略。克林顿式民主党人 (Clintonite Democrats) 声称由于民主党的新政思维 (New Deal mentality)，它已不再能体察美国老百姓的忧虑与渴望。为了在大选中重新获胜，民主党必须关注老百姓的心声，优先考虑“保守主义”的问题，比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优先考虑经济安全的问题。具体地讲，民主党认为他们必须放弃那种“征税加开支 (tax and spend)”的思路。

但是，福克斯认为这些阐释在历史上找不到依据。民主党的总统减税和增税的概率相差无几，而

一些共和党的总统，如里根，就曾经比民主党领导人在财政开支上更加不负责任——当然他们是为了国防的目的而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不是像民主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为了社会计划。在实践中，新民主党人提出的主要建议实际上只是那些“主流左派”早已呼吁很久的东西，如对教育和儿童保育增加投资。

福克斯宣称，对于民主党在 1992 年和 1996 年大选中的胜利，第三条道路并无创意。竞选主要是围绕经济因素展开的，而克林顿之所以能赢是因为得到了工会、少数族裔和穷人等传统民主党集团的支持。“所能总结出的经验只是充分就业击败了保守的家庭价值——而这恰恰是新民主党人主张的反面。”

福克斯说，保守派无情地抨击政府规模过大，而新民主党人已经做出了回应，他们勉强承认政府在对付市场暴行（the excesses of the market）方面的失败。美国的普通大众现在都直接面临着新全球经济的竞争，而克林顿式民主党人向他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你们得靠自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正在降低，新民主党人不是去扭转这一趋势，而是推动了它。

福克斯认为宣称第三条道路的思维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创造了一个有效的战略是没有说服力的。根本没有新战略，事实上只有一个旧的。第三条道路只是表

达了跨国公司的观点——政府作用越小，全球市场运转则越有效。而对这种观点的回应便是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敌视。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已超出了国际机构“防止市场自我破坏和由此导致的残酷结局的能力”。福克斯说，新民主党人认为中—左政党应当停止试图向人民保证什么，它们所能做的是帮助提供他们最佳生活的机会。虽然，“第三条道路正锐意推动新的全球经济，但这反过来却每天都在侵蚀着第三条道路的前提”。

福克斯还认为，第三条道路意在扩大机会，但对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却一言不发。第三条道路不是使政治决策“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的哲学，而“基本上是一种使左与右之间的政治妥协合理化的一套说辞，这其中，左派向右派发生偏移”。

英国的批评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998年12月，早已不再定期出版的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Maxism Today）在一次专刊中对新工党进行了系统的攻击。该杂志的封面是布莱尔的照片，横跨照片有几个巨大的字母，读作：“错了（Wrong）”。该刊中文文章的作者普遍批评新工党从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中汲取过多。

其中主要的一篇是有影响的思想家斯迪特·赫尔（Stuart Hall）所写，题目是《伟大的没有目标的行

进》(The great moving nowhere show)^①。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赫尔曾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撒切尔主义的性质和它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赫尔看来，撒切尔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理论，它的目标是为了改变政治景观 (political landscape)。撒切尔夫人知道她反对什么：“她知道，为了取得激进的变革，政治必须像对手之间的位置争夺战一样来运作。她清楚识别她的敌人，无情地划分政治阵营：自由派与保守派 (Wets V Drys)，我们与他们 (Us V Them)，我们的‘朋友’与我们‘内部的敌人’ (Those who are “with us” V “the enemy within”)。”

赫尔说，布莱尔和新工党宣称他们的计划同撒切尔夫人的计划一样雄心勃勃，但是在实践上，第三条道路避开了激进主义，而选择了在每件事情上都采取中庸的态度。它提倡“没有对手的政治” (politics without adversaries)，所以其结果只能是接受世界的现状而不是试图改造它。

赫尔认为，新工党已经屈从于一种影响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这种观点给第三条道路提供了“令人怀疑的合法性” (dubious legitimacy)。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做就像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一样，而全球市场

① Stuart Hall, 'The great moving nowhere show.' *Marxism Today* (November/December 1998): 9-14.

是自律的 (self-regulating) , 根本不需要社会或制度的框架。新工党已经被这种福音所诱惑。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已经取代了公民和公共领域。

赫尔说, 新工党的政策给人的印象是, 一个孤单的个人, 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孤立无援地面对生活的风险——“就像那些经常骑着山地车出现于我们大街上的消瘦的城市‘幸存者’ (survivors) 一样”。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使穷人与富人同样融入社会, 但是削减公共投资损害了福利领取人, 从而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社会体系, 其中富人能够自己付款满足自己的需求。

赫尔认为, 布莱尔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小册子不值一提。它虽然承认日益增长的不平等, 但却没有提出更公平的收入或财富再分配的战略。它也没有谈到权力, 相反倒是模糊地提及左派的价值观。赫尔争辩道, 界定一个左派政党的不是它的价值观, 而是它一贯的对市场的不满态度。

另外一个英国批评者阿兰·瑞安 (Alan Ryan) 提出了不同的对第三条道路政治及其新意的解读^①。他认为,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清晰的政治立场是可行的, 但它绝不是什么创新。早在一个世纪之前, 它就

^① Alan Ryan, 'Britain: recycling the third way'. *Dissent* 46/ 2 (Spring 1999.): 77-80.

出现在英国政治中，那时人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New Liberalism)。瑞安说：“真相是，第三条道路既不像它的崇拜者所说的那样是新工党主义，也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说的是回炉的 (warmed over) 撒切尔主义，而只是一种悠久观念的复原。”第三条道路试图避免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过度控制，但同时也不接受自由放任的市场，而这正是当时的新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甚至今天第三条道路所关注的选民的忧虑与社会问题也与 20 世纪初的情形相似。今天人们同 20 世纪初的人们一样关注日益恶化的教育和不断上升的犯罪率。

瑞安继续写道，事实上今天的第三条道路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它将像它的前身一样逐渐消逝。因为当经济周期开始下滑时，它不能就日益上升的失业率这类问题提出原则性的方案。那时，一个执行第三条道路政府将不得不要么左转，要么右转——即要么增税、借债；要么坚守财政紧缩立场，任由失业率上升。

瑞安认为，20 世纪初的第三条道路在一些方面要胜过近来的第三条道路。当前版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要力图在一个动荡的世界经济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与我们的需要相左；但在对付犯罪和教育等领域，它又表现出让人难以接受的权威主义色彩。瑞安说：“第三条道路只在跟 20 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相像的那

些内容上是逻辑连贯的，并且能给政府提供一个可取的思路，在那些与新自由主义不一致的地方，第三条道路既不严密又没有吸引力。”

欧洲大陆的反应

布莱尔与施罗德的联合声明在英国几乎没有受到注意，但在德国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前财政部长拉芳丹(Oskar Lafontaine)对这份声明及整个第三条道路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第三条道路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出路。^①

拉芳丹认为，“现代化”的观点几乎等同于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一概念被压缩至只限于经济领域，关于我们如何共同生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这些问题被认为是与“现代化”无关。社会民主党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关于“现代”(the modern)的观念，它扎根于启蒙时期的传统，个人自由是它的首要价值。左派必须反对市场的入侵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危险。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解除管制的政治决定的结果，这样，世界经济就成了一种赌场(Casino)经济——在这种特殊的赌场中，普通老百姓无缘登台。他们的钱却常常被用做赌资——比如说以退休金的形式，决定这些钱的命运的是银行、金

^① Oskar Lafontaine, *Das Herz schlägt links*. Munich: Econ, 1999.

融公司和其他权力的经纪人。

拉芳丹认为，为了把社会目标置于经济考虑之上，必须对金融市场及其控制者进行管制。在欧洲，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战略来控制世界市场的影响。欧洲联盟能够抵抗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通过保持较高的政府开支水平，欧盟能保护一个“社会的欧洲”（Social Europe）。为达此目标，欧盟必须协调税收政策。拉芳丹风趣地评论说，正是这个观点，才使太阳报（Sun newspaper）把他称为“欧洲最危险的家伙”。拉芳丹坚持认为，“我们社会的未来不能由市场决定，必须由民主选举的政府和议会来决定”。

在许多国家，类似的分歧也在“现代化者”（modernizes）和“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之间展开。但不同的是，一些左派批评者采取了非常不同于拉芳丹的立场。对他们而言，那些欧洲大陆社会民主更为发达的部门早已包含了第三条道路中有价值的东西。

芬兰作者埃齐·德米加（Erkki Tuomioja）认为，那种认为第三条道路的处方可能与其他欧洲国家，比如说北欧国家有关的说法“不能成立”^①。以福利改革为例，为什么英国的相关政策就一定与那些更成熟

^① Erkki Tuomioja, 'Blairism may not work elsewhere in Europe.' Newsletter of the Finnish Institute in London (July 1998).

的福利制度有某种渊源呢？毕竟，英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那种北欧国家的多数人民所熟悉和能接受的福利国家。英国（同美国一样）是所有发达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德米加说，第三条道路的作者们呼吁改革福利国家，因为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做得并不出色。德米加说，实际上，北欧的福利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国家通常把福利和公共服务惠及全体成员，而不是像英美那样。结果是大多数人都受惠于公共福利——这样，既实现了收入再分配，又增强了社会团结。

在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中，市民社会团体能够参与福利的运作，因此地方有很高程度的自治。跟英国不同，在北欧国家中争取公有制的斗争从来没有取得中心地位。芬兰在大多数方面早已是一个“第三条道路国家”。就拿养老金来说，芬兰有一个混合养老金体系，它包括政府提供的国家养老金，与自身收入相关的养老金，还有私有部门管理的养老金。

而且，北欧的福利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而英美国家现在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推出了“从福利转向工作”的计划。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自愿引入改革并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北欧社会民主的特征。德米加认为，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号召重新定位政治取向，因为已有的社会民主政